

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再情景化模式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

摘要:文化研究将语言视为理解世界和建构文化的主要手段,这为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跨文化交际过程提供了可能,而话语分析对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诸多因素辩证关系的研究,也为探索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人之间交流提供了借鉴。文化研究与话语研究的结合,促使我们提出一个“再情景化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解释这个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对跨文化交际的具体案例进行话语的解读和分析。

关键词:文化研究;话语研究;跨文化交际;再情景化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16)02-0050-05

一、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

在西方哲学不再将认识事物的本质作为研究的动力和终极目标,而是将如何表述事物的本质作为研究的重心时,西方哲学家发现“真理”与表述“真理”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语言的表述与建构作用。西方哲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最初体现在奥斯汀(Austin)^[1]和塞尔(Searle)^[2]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上面。然而,在20世纪中叶出现“语言转向”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不只是哲学,文化研究也是如此。文化研究学者也认识到,语言是人们理解世界和建构文化的主要手段和媒介。正如巴克和格拉辛斯基(Barker & Galasinski)^[3]所言,任何文化研究,即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研究,都是对语言的意义研究,是对意义的产生和传递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对语言及意义的关注构成了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

文化研究的语言转向对探索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新的路径。霍尔(Hall)^[4]在谈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时曾说过,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人对

他所经历的事物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不同文化中的人,其经历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事物的表述也不同。关于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的不同经历,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如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人,就与西方人的经历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不仅是经历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同的经历导致在语言表达方面产生出很多的差异。如我们使用的概念和词汇,包括“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反腐倡廉”等等,在西方学者表述他们经历的社会变革时就不可能出现。这些概念是某种特殊的经历所特有的,也是某种特殊表达方式的基础和前提。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其交流机制便是从语言层面的语词和表达式的相互借用入手,最终达到意义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田海龙以不同学科的学术话语交流为例,讨论了这种交流机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文化研究与话语研究相结合,提出一个从话语视角探索跨文化交际的“再情景化模

收稿日期:2015-11-25

基金项目: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科研立项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田海龙,男,河南安阳人,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式”^[5]。在阐释和应用这个分析模式之前,我们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厘清话语及话语体系这两个概念。

二、话语及话语体系

不同学科、不同流派、不同学者对“话语”这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解读和表述,这也构成了各种各样关于“话语”的话语,如社会学对“话语”概念的阐释构成社会学关于“话语”的话语,语言学对“话语”概念的阐释构成语言学关于“话语”的话语。在林林总总的关于“话语”的话语之中,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认为,“话语”的解读与跨文化交际机制的探索有着更紧密的内在联系。例如,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如费尔克劳 Fairclough)把“话语”理解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6],将“话语”这个概念所涵盖的“语言运用”层面和与语言运用相关的“社会因素”(如人的因素、智力因素以及人际关系因素)结合在一起,为进一步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如何传达意义奠定了基础。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位学者沃达克(Wodak)在认可这一解读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话语”是“围绕某一宏观主题展开的论述”^[7],这样就有了种族歧视话语、女性话语、恐怖主义话语、环境话语、中医话语、西医话语等的区分。这些不同主题的话语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领域,或曰不同的机构和利益集团。如果将这些不同的领域进一步理解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及其规范,沃达克如此对话语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解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话语的视角。

批评话语分析者认为,“话语”一方面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书面的和口语的),另一方面还包括人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以及制约这些语言运用方式的规约。“话语”是具体使用的语言与制约这些语言使用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二者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话语”的概念。根据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概念的解读,田海龙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交流对象、所在场合以及各自依托的组织和机构,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活动、构建身份、再现事实,形成不同领域中相互关联的话语实践。^{[8][9]}在这些话语实践中,不仅有语言运用的成分,还有与语言运用相关的社会因素,因为语言运用体现着语言使用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以及在此基础上,语言使用者对交流对象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所作的动态

的即时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是一个围绕语言使用者而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诸多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体系。

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话语”的话语可以抽象地解读为“社会实践”^[10],也可以具体地解读为“关于某个问题的陈述”^[11]。这与吉一(Gee)^[12]使用大写的D和小写的d来表示话语意义的方法异曲同工。吉一将那些为社会所接受的、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合适的事物进行言说、评价、谈论的方式统称为以大写的D开头的的话语(Discourse),而将那些具体使用的言语或篇章(如会话、故事等)统称为以小写的d开头的的话语(discourse)^[13]。如果将这些具体的“话语”联系起来,用一个领域(如政治或经济)囊括起来,或用一个宏观话题(如环境或教育)统领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以及“环境话语”和“教育话语”这些术语。这些“话语”有一定的形态(如语言运用的文本),在一定的话题和领域相互重叠交叉,形成一个网络联系,可称为“话语体系”^[14]。

“话语体系”的概念体现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联系,这也是批评话语分析所关注的,许多话语研究案例对“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分析就是如此。根据批评话语分析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观点,某个社会实践(如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不同话语(“政治话语”、“管理话语”)联系起来便可以形成一个“话语体系”。田海龙认为,与“话语秩序”的概念体现话语及体现不同社会结构关系不同,“话语体系”的概念强调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15]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不仅带来商品的快速流动,也促使以语言为媒介的各种思想广泛传播,“话语体系”概念的提出,将促进人们思考各种话语体系如何交流互动、交错存在的问题。

从话语的视角探索跨文化交际的机制,需要认识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关于话语体系的构成,斯克伦夫妇(Scollon & Scollon)^[16]认为,应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化活动、话语形式和面子体系。就跨文化交际而言,斯克伦夫妇认为其中任何一个构成因素都依赖和影响其他因素,但是,一个因素如何依赖和影响其他因素却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我国学者陈锡喜也讨论过话语体系的构成因素,认为“在话语体系中,概念、判断和推理是话语的基本要素,而话语的中心思想上话语体系的内核,各基本要素都是围绕这一内核而

展开的”^[17]。沿着这个脉络,田海龙认为,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体现在“使用的语言”和使用语言所要遵守的“社会规约”两个层面。^[18]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中,语言使用层面需要考虑的是语言运用形式,包括词汇、小句、文体、语域、格式,甚至是图像;而社会规约层面需要考虑的则是这些语言形式所体现的内容,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知识、经历、价值观、机构属性、以及语言使用的规则。例如,“中医话语体系”在语言使用层面有自己的术语和表达方式,在社会规约层面则有自己的理念、机构和操作方式。“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也有自己的概念、范畴和表达式,这些概念、范畴和表达式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基础的,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因而在社会规约层面体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内容。认识话语体系的这两个层面,既可以区分其不同,又可以强调其统一,有利于“再情景化模式”的操作。

三、再情景化模式

以上对话语和话语体系两个概念的讨论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上所述,如果文化被理解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的语言表述,那么文化研究的核心便是探索人类传情达意的交际活动。而且,如果不同文化间的交际被认为是不同文化中的人将自己文化中的社会活动推介给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同时又去理解另一种文化中的社会活动,那么这其中的语言即是交往的工具,也是需要理解的内容。这样,如果语言也是跨文化交际需要理解的内容,那么语言就不仅反映了一种文化中的社会活动,更是这种文化中社会活动的载体,与这些社会活动一样为这种文化所特有。因此,跨文化交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话语体系”与另一种文化的“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

探索这种不同文化间的“话语体系”交流机制是本文的一个任务。这里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便是从话语角度解读跨文化交际的一个分析框架。“再情景化(recontextualization)”是一个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经常涉及的概念,指一个文本从一个情景中移出并被植入另一个情景之中。^{[19][20]}这是一个动态的话语生产过程,而且有意识形态和权力等非话语因素参与其中。赵芃、田海龙从元话语的角度考察再情景化过程,指出元话语经过由话语制造者从原有情景中提取再植入新的情景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产生具有新的意义的新话语,更重

要的是,能从这个过程中看到由元话语引起的、由众多新话语相互关联起来的、关于元话语的话语史。^[21]在这个话语生产的历史中,元话语的制造者和再情景化始作俑者参与话语实践的痕迹一目了然,元话语的文本和通过再情景化产生的新话语也尽收眼底。赵芃、田海龙从元话语视角对再情景化的解读,为从话语角度解读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思考空间,也为提出一个再情景化模式奠定了思考基础,对进一步深入探究作用于话语生产过程的权力因素以及新话语的意义生成机制提供了可能。^[22]

再情景化模式包括以下几个分析步骤:

- 1) 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包括确定被移动的文本,思考随文本被移动的意义是什么,等等;
- 2) 确定原始情景:包括确定元话语所处的原始时间和空间,思考元话语的制造者及其与接受者是什么关系,等等;
- 3) 确定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包括确定是谁造成了再情景化过程的发生,等等;
- 4) 确定新的情景:包括确定元话语所处的新时空,思考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与新话语的接受者是什么关系,等等;
- 5) 确定新话语在新情景中的新意义: a) 对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而言: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实现? b) 对元话语而言:元话语与新场景其他构成成分有什么新关系产生?这种新关系产生什么新话语? c) 对新话语的接受者而言:他对再情景化的反映是什么?他认定的新意义是什么?他接受还是拒绝他所认定的新意义?

四、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

我们应用这个再情景化模式对纽约街头一个大广告屏中播放的中国宣传片(见下图)进行具体分析。



这是新华网播发的一幅矗立在纽约街头电视广告牌的截图画面。六名中国航天员出现在画面当中,这个画面居于图片的中央,上面一幅较小,下面一幅较大,这个画面的左边和右边都有不同的商品广告在播放。街头有行人走过,一名行人在拍照,但他的镜头不是对着广告牌,而是别的方向。

对本文作者来说,这幅中国航天员的画面是再熟悉不过了。在中国他们是航天英雄,是国家的功臣,是青少年学习的榜样,也是国家的骄傲。但是,他们所代表的这些意义会随着他们图像的出现而在纽约街头存在吗?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文化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考虑跨文化交际的机制。这样一个跨文化交际的案例可以用上面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来分析和解读。

1. 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

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是应用这个再情景化模式的第一步,包括确定被移动的文本以及随文本被移动的意义。就这个案例而言,所要确定的元话语首先是带有六名航天员照片的图像,同时要明确,随这个图像移动的还有这个图像承载的意义,即祖国的强盛。然而,根据前文对话语概念的界定,在确定什么是元话语时,不能简单地认定意义的体现形式,如文本或图片,而要考虑与这些表意形式密不可分的社会语境因素。换言之,确定被移动的元话语还要把图像和意义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来认识,将元话语确定为一种向世界“表明中国强盛的行动”。

2. 确定原始情景

确定原始情景是应用这个再情景化模式的第二步,内容包括确定元话语所处的时间和场景,思考元话语的制造者及其与接受者是什么关系。在时间层面上,可以确认这个图片产生于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国航天员顺利从太空返回的历史时刻;在空间层面上,可以确认它存在于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也可以出现在某个庆祝日的街头。就元话语的制造者而言,这个元话语的直接制造者可以是某个商业公司,但它的投资方一定是某级政府机构或某个政府部门,因为只有政府机构才是这个元话语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个元话语的接受者显而易见是观看这个图片的人,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青少年或中国街头的市民,他们与元话语制造者的关系是“接受-

宣介”的关系,从交流的渠道来看是单向的,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是制造者的地位高于接受者。

3. 确定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

依据这个再情景化模式,接下来就要确定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即确定是谁造成了再情景化过程的发生。就这个案例而言,是要分析谁将这样一个出现在中国庆祝场所或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的图片放在纽约街头的。可以确定是具有一定财力的机构所为,而且是中方机构。但是,资料所限,具体是政府还是商业公司所为,是哪级政府或哪个政府部门所为,或是哪个商业公司所为,就无法肯定了。然而,就这个案例而言,确定是中方机构促成了这个再情景化行为的发生即可,因为这已经为确定始作俑者的目的奠定了基础。

4. 确定新的情景

接下来就要确定新的情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首先,要确定元话语所处的新时间和新空间。在时间层面,可以确定这个新情景在原始情景之后;在空间层面,这个新场所是在纽约的街头,而且是商业区的街头。其次,要思考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与新话语的接受者是什么关系。上面的分析明确了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机构,而且是一个中方机构。这个被植入到新情景中的元话语可以称为新话语,它的接受者不再是中国庆祝日子里欢庆胜利的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的青少年,而大部分是纽约街头的游客或行人。这里中方机构也不再高于新话语接受者地位。换言之,机构还是在“宣介”,但接受者也不再是扮演“接受”的角色了。这种新的宣介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以及元话语所处的新时空,对元话语转变成新话语进而产生新意义,都有一定的作用,这将在下一个分析步骤中详述。

5. 确定新话语在新情景中的新意义

这个分析步骤是应用再情景化模式的最核心部分,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1)对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的新意义;2)对元话语的新意义;3)对新话语接受者的新意义。

前面的分析确定了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是中方机构,那么,新话语在新情景中对他而言的新意义就是他的目的是否已经实现,即他的行为价值是否实现。他的目的或行为预期价值可以有多个,比如,提升这个公司或政府部门的知名度,或者是宣传中国的航天精神。但是,如果把中国航天员图像搬到纽约街头的中方机构这样做的目的

与元话语制造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宣介中国强盛，那么他的这一目的就不如元话语制造者的宣介目的那样有效。如果没有充足的研究证明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把这个图像放在纽约街头能够收到有效的宣介效果，那么至少可以认为中方机构的宣介效果没有元话语制造者在国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更好。

在第三步确定新的情景时，我们确定中方机构把元话语置于一个新的情景之中。这个新的情景既是一个新的时空，也是一个包含不同接受者在内的多成分构成体。元话语与新情景中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与其在原始情景中与这种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图像还是原来的展示航天员风采的图像，但是元话语已成为新话语，具有新意义了。如果元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向世界“表明中国强盛的行动”（见第一步的分析），那么新话语相对于元话语的新意义或许就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崛起的行动”。这种新意义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图像与周边图像的关系，比如左右两边的商业广告面积更大，另一方面取决于图像中航天员所处的“前景”位置以及他们目光与观看者的接触。如此产生的“构图意义”和“人际意义”都较右边一幅有人像的广告以及左边没有人像的广告更醒目。^[23]特别是图像居高临下的位置，航天员俯视路人的那种自信的神态，更是强化了新话语的新意义。

接下来讨论对新话语接受者的新意义。处于新的情景之中的新话语，其接受者便是纽约街头的游客和行人。他们看到这样一幅图像矗立在纽约街头有什么反映？是否也认为这是中方机构表明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行动”？准确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手段，但是，仅从这个截图图像中路人的反映来看，他们似乎不是特别关注这样的行动。这表明，中方机构通过再情景化的手段将元话语从其原始情景移除，并置于新的情景之中。尽管通过这样的过程，中方机构创造出新话语，但是这个新话语在新的情景中由于

接受者的原因，使其新意义的认可度大打折扣。

五、讨论与结语

依据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对跨文化交际的这个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此过程中有两个明显的变化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被移动的元话语变成了新情景中的新话语。分析表明，尽管图像没有变化，但由于情景的变化，这个图像由“表明中国强盛行动”的元话语变成了“表明中国崛起行动”的新话语。正所谓，情景决定了意义。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再情景化模式”的贡献在于，它说明了新话语是由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创造的。因此，新话语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由语境决定的，而是由依托一定机构的社会人“赋予”^[24]的。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没有中方机构制造这个再情景化行为，也就不会产生新话语，不会赋予这个新话语以新意义，更不会有新话语的新意义和新实践。

第二，原始情景变成了新情景。这里的情景，包括时空和交际双方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由交际双方共同主观建构。^[25]原始情景中，元话语的接受者认可元话语制造者的宣介，所以宣介的效果尚好。在新情景中，再情景化的始作俑者对新话语的接受者来说没有了被认可的权威，所以他的宣介效果就变得捉摸不定。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一方要取得好的交际效果已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需要考虑另一种文化情景中的交际方的实际情况。

以上两个变化体现在话语和情景上，但实际上是跨文化交际主体本身的变化。跨文化交际的主体实际上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关注他们在话语实践中的作用，研究他们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他们赋予符号以意义的手段和策略，实际上是话语研究与仅关注交际形式的任何其他研究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里提出的“再情景化模式”对从话语角度探究跨文化交际的机制或许是一个贡献。当然，这样一个模式还需要在更多的案例分析中得到完善。

注释：

[1] Austin J.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Searle J. *Expression an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Barker C. and Galasinski D.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Sage, 2001.

(下转第 60 页)

开辟出星光之“道”。

注释:

- [1] 黄中习 《文化典籍英译与苏州大学翻译方向研究生教学》,《上海翻译》2007 年第 1 期。
- [2] 王宏印、李绍青 《翻译中华典籍 传播神州文化——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王宏印访谈录》,《当代外语研究》2015 年第 3 期。
- [3]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诠释学 I: 真理与方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第 526 页。
- [4] [5]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诠释学 II: 真理与方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第 192, 223 页。
- [6] 邬昆如 《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台北: 台湾编译馆,1976 年,第 3-4 页。
- [7] [德]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第 190-192 页。
- [8] Leegge James, *The Texts of Taoism*, New York: The Julian Press, Inc., 1959 p. 61.
- [9]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8-23, 290.
- [10]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69-95 页。
- [11] 王琰 《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第 205-206 页。

[责任编辑: 石雪梅]

(上接第 54 页)

- [4] Hall S. Introduction, In S.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Sage, 1997, pp. 1-12.
- [5] [14] [18] 田海龙 《学术话语的交流与交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 [6] [10] Fairclough 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7] [11] Wodak R., "What CDA is About -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1, pp. 1-13.
- [8] 田海龙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 [9] 田海龙 《批评话语分析: 阐释、思考、应用》,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12] [13] Gee J. P.,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 17-18.
- [15] 陈大亮 《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 交融与互鉴——访天津外国语大学田海龙教授》,《对外传播》2015 年第 10 期。
- [16] Scollon, R. and Scollon S. W.,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Beijing: FLTRP and Blackwell, 1995/2000 pp. 97-98.
- [17] 陈锡喜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41 页。
- [19] Bernstein B.,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1990.
- [20] van Leeuwen T.,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New Tool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1] [22] 赵芃、田海龙 《再情景化新解: 元话语视角》,《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 [23]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1996.
- [24] 田海龙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社会符号学视角》,《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
- [25] van Dijk T.,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责任编辑: 石雪梅]